

往事自述

周 祖 谟

—



我出身于北京的一个中等家庭，1914年11月19日生。祖父和父亲都曾是商业的店员，赁屋而居，量入为出。据说上辈也有中过乡试举人的，远祖有为翰林学士的，籍隶杭州。父祖都读过一些书，至少是《四书》、《千家诗》、《算法统宗》等都念过一些。所以我幼年在京城未入小学以前，母亲督促我描红练字，而父亲亲自教我念《千字文》、《百家姓》、《大学》、《论语》等书。一方面为了认识一些字，另一方面讲一些为人的道德准则。现在回想起来，老人在“正心”、“修身”、“入则孝”、“出则悌”都三致意焉，至今还留有印象。一九八一年日本汉学家、老朋友小川环树先生来华，宴席间谈到他在幼年祖父首先教他的也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们都不禁笑了。这都是共同经历的一段旧式的儒家教育。

不过，我在六岁入小学以后，对那些读过的东西随着光阴的流逝，大部分都背诵不下来了。惟有《论语》中“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一节，至今没有忘。因为从中体会到

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子女就不应当使父母担忧。因此我在行动和言语上都养成一种谨敕的性格。既避免与人冲突，更不敢惹是生非。久而久之，变得柔弱，好安静，不喜喧哗。平时勤俭自治有余，而与人交接较少，在学习上很少跟别人讨论，未免孤陋寡闻。兴趣虽然较多，喜欢音乐，也喜欢绘画，终为天资和时间所限，只好搁置一边了。

由于幼年受了家庭教育的影响，年纪小，体质又弱，只能走按部就班的由小学而入中学，由中学而入大学的学习道路。

二

在小学是怎样度过的，已经回忆不很清了。在国语、算术之外，还有手工、图画、历史、地理。我极喜欢地理，而且学着画地图。说也奇怪，在语文课堂上还念了一些古代文言文，如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范仲淹《岳阳楼记》，欧阳修《醉翁亭记》之类。可见在教学上那时候是没有什么规范的。在1923至1924年间，我在课外读过不少中华书局出版的《小小说》，如《草船借箭》、《火烧草料场》、《陆压道人》之类。那是一种丛刊的性质，从中我获得不少历史和文学方面的知识。当时，《三国志演义》也是我喜欢读的，尽管有些我并不完全懂。除了这些，对叶圣陶先生的《稻草人》和谢冰心先生的《寄小读者》都觉得文字清新有趣，可惜对新的文学作品理解的很少。那时经常听的乐曲是萧友梅的《梅花三弄》，所唱的歌大都是赵元任先生所谱的曲子。如“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唐人崔颢诗），和“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唐人李颀诗），这些到现在还能唱，我的嗓音带还是好的。真没想到1936年我在北京大学毕业后考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到了南京，居然能见到赵先生，并亲聆到他的教诲。

我入的小学校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设的平民小学。高师的

校长是范源濂（静生）先生，后来改称师范大学。我曾经在高师的风雨操场（那时没有礼堂）见到过梁启超和章炳麟两位先生在讲演。梁先生讲的是政治，听的人很多；章先生讲的是清代的学术，听的人很少。我侧立在入门处一旁，看见章先生头发已经斑白，带着一副白眼镜，坐在一条板凳上，面前一个课桌，讲的是一口南方话，我简直听不懂。在他身后有两位先生代写黑板，什么戴震啦、孔广森啦，我哪知道那些？当然不懂。直到我上大学的时候，才回想起来当时写黑板的都是谁了。矮而胖的是钱玄同先生，高而稍瘦的是马裕藻先生，他们都是我在大学时的先生，当时他们都很年轻。我认为在那时我能见到章先生是一件很有纪念意义的事情。章先生的学问是邈不可攀的，但从此以后再不曾见过面，终觉歉然。

小学的老师都是高师三四年级的学生，二三十岁，有的还有小胡子，非常和善可亲。不过有一次我被斥罚站，因为“国语”课文中有“衣宜常洗，几宜常拭”的一个“拭”字，老师叫我念，我念为“式”，老师立即斥责说：“你只知道念半边字！那个字应当念‘抹’（ma）。”啊，这就错了！他准是外省人，没念过什么蒙学书。但是我们对老师都是极其尊敬的。尊敬老师的性情蕴蓄很深，至今未变。虽然老师也会一时有误，但并不足奇，这正说明为师不易而已。这位老师见我写的小字好，常被放在玻璃窗里展览，满纸红圈，所以也有时叫我替他抄点文稿。既得到老师的青睐，我自然也很高兴。

在小学不懂得什么政治，但在老师的教导下，知道了“爱国爱民”的含义。1922年至1924年直奉军队两次交战，民生凋敝，外患也正方兴未艾。国事日蹙，志士仁人都在奋起救国。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由南方到北京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不幸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那一天，狂风骤作，满天飞降黄沙，铺天盖地，日色昏黄。中山先生的灵柩被放在中央公园大殿内（即今之中山

公园中山堂），供人吊唁。全校同学都列队前往公祭，并得身临水晶棺旁，瞻仰遗容默哀。中山先生那安详的容颜，至今印象犹深。这也是我一生难忘的一件事情。

三

小学我只读了四年，接连跳了两级，所以十一岁的时候就步入中学了。开始入的是北京师范学校，后转入志成中学。初中的前两年，浑浑噩噩，没有值得说的，数学、英语都不行。直到后两年才开始立志发奋，稍知学习门路，渐有成效。但是起步已晚。初中毕业后，贸然报考师范大学。英文是一篇作文，考试题目是“The Summer Vacation”，我写了一些如何过暑假、游公园一类的事，什么 willow 啦，lotus blooms 啦都用上了。国文大概是翻译《世说新语》：“张季鹰辟为太尉掾，见秋风起，因思蓴羹鲈脍”那一段，还有分析《礼记·檀弓》“南宫縶之妻之姑之丧”和其他句子的文法结构。数学答卷最差，结果自然落第了。这次的失败是我在学习知识的路程上的一次重大的转折点，由此我理解到应当自己怎样去寻找参考读物和怎样自学了。我停学了一年，自己买“题解”一类的参考书，学习几何、三角、大代数，同时用力学习英语。第二年，1930年我考入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男部，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师大附中是师资最好的一个中学。当时的校长是林励儒先生，代理校长是教务主任张鸿来先生。所有的教师都是师大培养出来的第一流的教师。课程的设置也比别的学校多。高中分文理科两班。理科就有微积分，高等物理学；文科有文字学，欧美名家小说选（英语）。两班在正课外都有两三门选科，学生可以自由选习。数学的课本是英文的，也比较特殊。在教材方面，比一般学校都提高得很多。所有的先生都各有专门，善于讲授。我选的是文科班，那时国文课除学习先秦诸子散文以外，还兼授文学史，如董璠

（鲁安）先生讲《楚辞》，夏宇众先生讲《中国诗史》（陆侃如、冯沅君编，上海大江书店出版）。选课中孙云生先生讲社会学、吴三立（辛旨）先生讲文字学，刘祝三先生讲欧美名家小说选，高博彦先生讲中国近代史。在外文方面，除英语外，还设有德文和日文做为第二外语。这真是一个从各方面真诚为造就人才而设的第一流中学。既要求学生有必要的文科基本学识，又要具备广泛的文化常识。属于理科方面的课程如数学、物理、化学，文科班也跟理科是一样的。在这样环境里确实获得很丰富的学识，给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各位先生学识的渊博，教课态度的认真负责，感人至深。他们的声音形象，至今仍记忆犹新。

因此，讲到学校的教育，我认为中学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而中学教育有没有好的师资最关重要。有好的合格的老师 教育才有好效果。从三十年代起，北京的第四中学也一直是很有名的学校。第四中学是以理科出名的。中学教育在高级阶段对分为文理两班我认为也未可厚非。我之所以学习文科课程，主要是因为数学基础稍差，理解力不强，终究不如顺乎个性，学文为好。

四

北京是中国的一个文化古都，以往随处可见，而在南城和平门外琉璃厂一带表现的最为突出。有字画店、古玩铺、古书店、碑帖店、新书店、笔墨庄、裱画店。由琉璃厂的东门直到西门的一条长街上店铺林立，莫不与文化有关。其间出售文物的有博古斋、聚珍斋，出售笔墨的有贺莲青、青莲阁、戴月轩，出售碑帖旧砚的有墨宝斋、会文阁，出售字画的如荣宝斋的铺子就有三四家。至于卖古旧书的铺子就更多了。小的店家不论，大的如富晋书社，邃雅斋，来薰阁，文奎堂，通学斋都是很有名的。卖新书的则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北新书局。这里真是文化荟萃之所。至于在琉璃厂中间的海王村公园里，出卖文玩字画石章端砚的铺子，围绕东西两厢就更数不

过来了。

我家住的地址离琉璃厂不很远。上小学时每天都要沿着这条古老的充溢着文化气息的街道走。南北都有店铺，去时看右边，回时看左边，有时会在窗外定睛多看一眼，无形中受到许多熏陶。

青莲阁是我经常去买毛笔的铺子，那位店主人对我很好。他是一位年近六十的湖州人，身着一件淡雅的湖绿色丝织的长衫，外加一件丝绸的团花的青马褂，头上是带着的红顶子的瓜皮帽，面色红润，和蔼可亲。由于那时我的身材刚刚够得上很高的柜台，他总笑迷迷的，俯身问我要买什么笔。他拿出一盒子来，任凭我挑，而且允许我把笔头用水浸开，教给我怎样看才是好用的。选妥以后他还会为我再加加工。店伙们也斜着眼看着店主那股殷勤的劲儿不知心里在想什么。店主人有时还问问我：“你喜欢临摹什么字帖呀？”我也许怕说出来他不知道，就答道：“跟你们那个门匾的字差不多。”他笑嘻嘻地说：“喔，那是很好咯。”可是其他的笔店就没有这样和气了。

谈到琉璃厂，最不能忘怀的是每年春节时候的“厂甸儿”。每年从夏历正月初一到十五，由和平门向南围绕海王村公园左右有如庙会似的，卖鞭炮的、卖风筝的、卖小吃的都来这里设摊，招揽顾客，极其热闹，而卖古旧书的最多。在和平门外街道两旁都是书摊，这是一个特殊的出售古书的书市。这个风习从清代就已如此，通称“厂肆”。在这样的书摊上，经史子集各类书无所不有，琳琅满目，任人挑选。我从小学到中学每年这个期间，除了下雪天以外，几乎每天都要到书市上去看看。可尊敬的终身在传播文化的书商是竭诚欢迎有人来自由翻阅的。从十六七岁起我就慢慢买起喜爱的古书来了。如《楚辞》、《文选》、《古文辞类纂》、《史通通释》、《书目答问》、《杜诗详注》之类。遇到有朱墨批点的诗文集等书，即使不全，残缺一二，有时也一并买下，观摩前人是在什么地方着眼的，藉此也可以提高自己鉴赏的

能力。父亲看了，也很高兴。在买书看书的过程中跟许多位年长的书商交往熟了，从他们的口里又学得许多有关书籍的纸张和板刻的知识。如对连史纸、皮纸、官堆纸、开花纸以及不同产地的竹纸和各省雕板字形的特点等都有所了解。这对我后来注意板本目录的学识大有裨益。

除书籍外，厂甸儿还有许多画棚，专卖旧字画，任人参观。其中真贋夹杂，但又是了解民族文化艺术的另一场面。琉璃厂东门路北，旧有火神庙，在春节期间是专卖古玩、玉器、玛瑙、翡翠、珍宝、瓷器的所在。北京所有的古董商家都在此陈设商品出售。珠光宝气，耀人眼目。这时，外国人接踵而至，购买自己喜爱的东西，本国人也可以仔细观赏，比到故宫博物院珍宝馆隔着厚玻璃去看那些陈列品痛快多了。

文化的教养对一国的人民是非常重要的，上面所说不过是一些春明旧事，烟尘悠邈；然而在旧社会里对于人们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开阔人的眼界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我记得钱玄同先生、张鸿来先生都是厂甸儿书市上来往很勤的人。厂甸儿的书籍、字画、文玩、古物都给我增添了不少的知识，我认为比上课还重要，这恰恰是社会文化教育的一种。同时，我也买过王翬（石谷），恽寿平（南田）的册页，齐璜（白石）的蝦米和大公鸡，即使是假的，也假的不错，给自己增添了不少乐趣。旧时春节的厂甸儿是难以忘却的。

五

1932年我投考清华大学英语系。同时兼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清华的国文试题是作文一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记”，另外还有对对子，题目是“孙行者”。“孙行者”据说是陈寅恪先生所出。清华园我曾参观过，所以有话可说，孙行者就对以“胡适之”。北京大学的国文试题之一是翻译杜甫《八月茅屋为秋

风所破歌》，这篇诗我在小学时就背熟了，自然不难。国文考了90分。发榜时，两校都蒙录取。这一年是十八岁。本意想入清华英语系，因为用费多，上不起，只得入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了。

那时北大的校长是蒋梦麟，文学院院长是胡适。中文系一年级有一定的基础课，有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中国音韵学概要、文字学概要、历代文选等课程，还有一门英语必修课。中国通史是分别由许多文学院的历史系教授分担的，每人讲一个专题，所以我们称之为“百衲本”的历史课。中国文学史由罗庸（膺中）先生担任，由先秦讲到清末，一年讲完。中国音韵学概要由马裕藻（幼渔）先生担任。文字学概要由沈兼士先生担任，历代文学作品选由郑奠（石君）先生担任。

到二年级，课程分为三组：一组是语言文字组，二组是文学组，三组是古籍校订组。每组都各有一些专门课程，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志愿确定学习哪一组课程。不过，也可以在主修课（必修课）之外选修别组的课程，甚至于可以选修其他系的如历史系、外语系的课程。选课是有指导的，由系主任或助教签字认可就行。这样做，既能使学生有一定的主修专业方向，同时又具有灵活而不拘泥的优点，给学生以自由发展的机会。由二年级到四年级都是如此。每门课程有一定的学分，修够四年的总学分数才准予毕业。第四年要由导师指导作毕业论文，论文必须及格。

各系的主要课程都由教授担任。一年级课程必是如此。教授为专职，必须教三门课程。不足三门的，可以被聘为名誉教授，或聘为讲师。讲师也是专家学者，大都只教一门，属于兼课性质，他在别的大学可能是专任教授。以中国语言文学系而论，如沈兼士、钱玄同、俞平伯、闻一多、余嘉锡、吴承仕、唐兰、赵万里、刘文典诸位先生都到北大兼过课。一时名师硕彦都惠然莅止，可谓极一时之盛了。北大从蔡元培做校长时起对不同学术的流派一直采取兼容并包的办法，所以门类也特别多。学生可以自由选听，

不选课的人也可以到教室旁听，这种自由的学风，对于学生知识面的扩充和学生研究兴趣的提高都是必要的。

二年级既然要分组，我选定哪一组呢？很费斟酌。经过考虑，我认为文学和文学史自学起来总容易些，而语言文字的课程不能无师自通，非听讲不可。因此就决定入语言文字组。何况在中学时屡次听到吴三立先生讲述沈兼士先生在文字学方面的卓越见解，于今竟能亲承讲贯，岂可不知感奋？二年级时沈先生讲授《说文解字》，循循善诱，启发后进，不遗余力，由是得知为学门径。这一年刘复（半农）先生讲授语音学。刘先生创设了语音乐律实验室，通过实验，我们对语音的分析多了一番理解，同时学习辨音、记音。钱玄同先生讲中国音韵沿革，魏建功先生讲韵书研究、方言研究。课程门类增多，我对语言文字学产生更大的兴趣，而且对如何治学也略有体会。

开始是写札记，把在读书当中有的一些疑问和解释写下来，遇到难点就去找书，《书目答问》就成为找书的指南。在找书的过程中又增加了不少知识。读到段玉裁的《汲古阁说文订》，知道古书在传刻中往往有讹误，于是试取清代传刻的几种宋本《说文解字》进行校勘，写成《说文解字之传本》一文，指出各本的异同，并定其正误，同时证明孙星衍所刻的平津馆丛书本与段氏所说的周锡瓚（漪塘）本为同一传本，比其他各本为优，以此呈兼士先生教正，颇蒙赞许，并被登载于《国学季刊》。这是我从事学术研究之始。这一年除听语言文学课程外，还兼选听其他两组课程，如唐诗宋词、目录学等课，有时还听一些历史系的课程，如钱穆先生的先秦史。

1934年刘复先生不幸染回归热病逝世。秋季罗常培（莘田）先生来校，讲授语言学、方言调查、等韵学以及域外学者中国音韵研究。先生当时年仅三十五岁，风标卓越，语音清亮，讲解明晰，层次井然，深受欢迎。这一年唐兰（立庵）先生来校，主讲

甲骨文和钟鼎文，在罗振玉、王国维两家著作的基础上注重文字演变的条例和认识古文字的方法，因而获得很多新的知识。同时在课余又进一步探讨“雅学”，继清人胡元玉《雅学考》作《续雅学考书目》将清代有关雅学的书分类立目，撮举其要。这时，清华大学刘文典（叔雅）先生来校教《昭明文选》（讲木华《海赋》），兼教《校勘学》，我前往旁听，得窥校勘门径，且得先生指点者独多。那时他正作《庄子补正》一书，也以先睹为快。

到了四年级，除听课外，开始作毕业论文，题目定为《篆隶万象名义中之原本玉篇音系》，导师即为莘田先生。《篆隶万象名义》为唐德宗时日本入唐求法高僧空海大师据顾野王原本《玉篇》而撰，由其中所注反切可以推求《玉篇》所代表的齐梁时代的语音系统。我抄录了两万多张卡片，离析其声韵部类，用陈澧的“反切系联法”进行研究，所得结果与陆德明《经典释文》音可以互相印证，使我们对中古音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当时中国语言文学系有两位罗先生，一为罗庸（膺中）先生，主讲文学史、唐诗、宋词，一为莘田先生。前者人称小罗先生，后者人称大罗先生。他们都方当盛年，不过三十余岁，然而学问之精湛，实在令人钦佩。膺中先生学问尤为渊博，经学、小学、金石学都能辨章源流，示人以门径。遗憾的是享年不永，全国解放之初就逝世，葬于重庆北碚。

我在北大读书四年，得从一代学术名师受业，并蒙一再奖掖，不仅获得学识，而且获得研究学术的门径和方法，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各位教师并不以博学自炫，而却能超迈前人，出其心得，使听者有所开悟，知所取裁，教师之可贵处也就在这里。而今在当年我所承教问业的先生们都已于近三四十年间先后逝世，思念之下不禁黯然凄怆。

六

在北大临毕业的时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委托校勘宋本《广韵》，于是就当时所能运用的材料，如唐本的韵书，《玉篇》、《集韵》、各种刻本的《广韵》以及有关的古籍相互比勘，以张士俊所刻泽存堂本《广韵》为底本，改正其讹误，作为定本，并写成《广韵校勘记》五卷，这是我第一次写出的一本著作。后来到1938年，商务印书馆在香港出版。

我毕业那一年，1936年，二十二岁，考入历史语言所语言组，任助理员。秋季八月到南京北极阁任职，得谒见主任赵元任先生，承蒙恳切指导，这是多年向往的事。同年入所的还有董同龢先生，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我们两个人同居一室，朝夕相处，研讨音韵，大有论学之乐。在历史语言所认识了许多朋友，都是学有专长的。如周一良、胡厚宣、丁声树、陈述。同在一个办公室的则是吴宗济先生。我在誊录《广韵校勘记》准备付印，吴先生则在帮助李方桂先生编定《龙州土语》。

1937年6月因母病归北平省亲，不料七月芦沟桥变作，交通阻绝，不得南下，只得键户读书。延至1939年，应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援庵）先生聘，到辅仁大学讲授国文课。1940年开始在国文系讲课，连续八年之久，都由校长聘任。开始由教员提升为讲师，后又由讲师提升为副教授。先后所教课程有语音学、等韵学、高本汉音韵学、比较训诂学、《说文》研究、《尔雅》研究、《方言》研究、《释名》研究、《楚辞》研究、甲骨文研究、金文研究、《洛阳伽兰记》等课程，包括二、三、四年级课程，每周多至七八小时。八年之内，月入甚微，杯水车薪，生活困窘至极，然而在与青年同学共忧乐，且以砥砺名节相劝勉，并以自己所学所知传授给同学，使知为学的门径，颇有薪尽火传的意思在内。所以虽篝灯夜半，批改作业，撰写讲稿，出其所见，不以为苦，反

以为乐。一息苟存，不敢荒怠。在教课之余，还写成《洛阳伽兰记校释》五卷，《尔雅校笺》三卷，《方言校笺》十三卷。在抗战八年岁月中所读史部书和宋元人文集也较多。常谒援庵先生请教，论列史籍，得闻绪论，受益不浅。凡所写有关韵学和考史的文章发表在《辅仁学志》的都曾送请先生审阅，先生在嘉勉之余，也时有批示，感念不尽。

辅仁大学中文系有“语文学会”，由兼士先生主持，每月举行一次讲演会，由教师讲述所研究过的某一问题，互相讨论，以促进学科的发展。研究生一律参加。事后并印成讲演集。这种作法，在国外有些研究机关也是有的。教师间学术的彼此交流在整个教学工作中也是很必要的，不容忽视。

我在这八年的教学生活中经受了困难，但在举国抵御外侮之时，身处于沦陷区，而能以知识传授给学生，希冀其异日能为民为国尽力，不惜自己日夜劳作，没有虚度光阴，足以自慰。而且自己讲授课程的内容都是经过研究，熔铸以出，自有其明确的系统性和个人独到的见解，不是照本宣科，因而在备课中自己的学识也不断地有所增长加深加广，古人所说“教学相长”，信哉不虚。惟其要教课，自然要从事深入的研究，因此，自二十五岁至三十三岁都沉浸在教学备课、撰写讲稿和学术论文当中了。

七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中国人民开始获得苏醒，举国欢庆。南迁的清华、北大、南开几所大学相继复校。北京大学于1946年回到北平。校长为胡适，代理校长为傅斯年。凡聘请教评要由授议会通过。我被聘为副教授，兼图书馆专门委员和文科研究所秘书。并被聘为《国学季刊》编辑委员。同时在中文系讲“中国音韵学”。文科研究所原是培养研究生的，在抗战时期从北平迁至昆明。现在有不少教授学者是抗战时期在研究所毕业的。复

员后，研究生所长为汤用彤先生，所内依旧分别设立语音乐律实验室，考古研究室，金石碑刻研究室和明清档案研究室。各有专门研究人员进行研究工作。《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会则设于文科研究所。解放以后，文科研究所不复存在。我在中文系从事教学工作。所教课程有工具书使用法、应用文和中国现代语。这些课程都是首次开设的，以前的课程表中没有。

八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人民政府教育部、文化部、出版总署的领导下，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蓬勃的发展。大学招生的人数大为扩充，课程也不断改革和调整，以适应实际的需要。

1951年院系调整，我任北京大学教授，学校由城内沙滩迁至西郊海淀燕京大学旧址。经过教育改革之后，中文系的课程改动很大。杨晦（慧修）先生主持系务。开始我曾被借调教少数民族医科预备班和外国留学生班的汉语课，1953年回系担任现代汉语课程。开始时专讲语法，再后始兼讲语音文字部分。同时兼任中国科学院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两杂志编辑委员。1955年受高教部委托起草现代汉语教学大纲，供高校教师讨论实施。

1958年以后所讲课有“语言文学要籍解题”、“《说文解字》研究”、“中国音韵学”等课，并为外国留学生讲授“汉语史”。同时担任现代汉语研究生和进修教师的导师。在这一年内写成《汉语词汇讲话》在《语文学习》杂志上分期发表，后又修订成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曾先后印行十九万册，这是我为语文教学所写的一本参考读物。

解放以后除了《广韵校本》重印外，又印行了《方言校笺》、《洛阳伽兰记校释》、《两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与罗先生合著）、《问学集》、《广韵四声韵字表》、《唐五

代韵书集存》、《尔雅校笺》等书。已交印的还有《语言文史论集》和《周祖谟语文论集》两本书。

《问学集》包括论文四十四篇，是从1934年至1962年所写有关汉语语言文字音韵训诂的文章，可以说代表我治学的几个不同方面。其中有的是类似的题目，但写的方式不同，用意在于练习。如《禅母古读考》和《审母古读考》即是如此。有些考证文字，如《切韵的性质及其音系的基础》和《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考》旁搜远绍，用力较多，也不过是谨陈所见，以供读者裁定。

《唐五代韵书集存附考释》自1945年着手搜集材料，经过二十多年，到1965年才写定成书。由陆法言《切韵》的最早写本以至五代刻本韵书都汇集在一起，一一加以考释，定其时代的早晚和内容的特点，叙次先后。惟有几种资料受了条件的限制未能辑入，尚待补苴。这些材料不仅对研究韵书源流和语音系统有用，而且对研究汉语词汇与词义的发展也大有用处。（1986年5月北京大学举行首届科学研究成果奖，获荣誉奖，并颁授荣誉证书）。

1966年至1976年全国鼎沸，动乱不宁。十载岁月，空空在扰攘中度过，实为可惜。到1978年在拨乱反正之后，学校教学始恢复正常，我由汉语专业转到古典文献专业工作。1979年4月10日学校聘为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1981年11月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导师。12月10日国务院聘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员。1982年6月17日学校任命为古典文献专业教研室主任兼研究室主任。1984年研究室改为研究所，一度任所长。1983年11月11日教育部聘任为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

自1980年以后学术活动增多起来，中国语言学会成立，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语言学会成立，被推选为副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成立，被推选为名誉会长，中国

训诂学研究会成立，被聘为学术顾问，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被推选为顾问，并被聘为学术委员会委员。这些学会都是民间的学术团体，但为发扬学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一些省的教育厅和大学都给予支持，使得各学会能在一年或隔一年内开一次学术讨论会，会员们可以交流信息，提出论文，互相讨论，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

任何学术都要互相研讨，互相切磋，国内国外的学术界也应当互访，交流研究经验和科学研究成果。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创办多年，很有声誉。1981年我应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和中国语言文学系邀请前往讲学，并访问香港大学，得与许多学者相识。1984年5月承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长服部正明教授和清水茂教授邀请访日讲学，又应小川环树教授邀请参加日本第二十九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并作专题学术讲演。六月间访问东京大学作公开学术讲演，并参加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术文化研究所召开的学术讨论会，又访问了东方文化研究所和早稻田大学。七月返回京都，八月间又到静冈大学和大阪外国语大学讲学，九月中回国。在访问期间结识了许多日本著名学者，并参观了很多有名的文库和图书馆，深感文化交流之必要。日本学者对教育事业的热诚，工作的勤恳，掌握材料的丰富，图书出版事业的发达，图书资料的便于检索和使用，都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我在与许多先生交谈中也受益不浅。

九

今年是1987年，现在又届岁暮，所怀万端，难以尽述，简单写来，聊当回忆录而已。

我从小学而入中学，又入大学，以至于从1939年起到现在在大学从事教学工作，我不能不感谢我的先生对我的教导与栽培。我深刻体会到师长们对莘莘学子的爱护和奖掖，其恳挚和亲切之情

是如何的珍贵，没有师长的谆谆教诲和不断的鼓舞是不易有所成就的。先生和蔼的仪容和温良的风范，不期而然的会使人闻风兴起。所以人才的培养与教师的态度、言论和学识的多少都有密切的关系。可是学生是否成材，又与学生肯否用心，肯否尊师，能否正心诚意地从师问业大有关系。

我在大学读书时既深受先生的鼓励，而更得图书馆之助。我在学识的增长上受惠最多的也是图书馆。北大的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辅仁大学图书馆、华裔学志的图书馆，都给了我极大的方便。北大图书馆旧日的馆员先生工资低，而图书的知识极为丰富。他可以指点给我一部书有哪些板本，他可以把全部的明正统《道藏》的影印本调出书库给我看。北京图书馆的丁主任能不辞辛苦为我找到需用的某一类的图书。华裔学志图书馆的负责人允许我把《大正大藏经》的一本带回家去抄录。对过去这种难得的机遇是难以忘掉的。当然，现在是不能有的，时间和情势都跟过去不一样了。古人说“积学以储宝”，我有不少知识是从自由听课和自己在图书馆找书、看书、抄书得来的。因此我进一步想到有好的环境和好的条件对人才的培养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我不是富家子弟，不能不自知奋励。王国维《浣溪沙》的两句：“万事不如身手好，一生当惜少年时”曾经给我很大的动力。曹丕的《与吴质书》曾说：“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使人警悚，更不敢荒怠。所以我在语言文字书籍之外，尽量抽出时间阅读文史两方面的书，吸取多方面的知识，以提高自己的学术素养。惟独无暇去看小说，虽然我也听过“小说史”的课程，但那是两回事。有些诗词散文之类，我大都是用零散的时间来读的，所读都是自己喜爱的作品。读之又读，久而成诵。我不大下死记硬背的工夫，也不劝我的学生“死背书”。我也看选本，如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张惠言的《词选》、李兆洛的《骈体文钞》，但我更偏爱读一个人的专集，从作家一个人的

著作中去了解他的身世和当时的历史，从而了解他的作品的特点。

曾经有不少青年问到我是怎样治学的，说来话长，也说不好。不过，我可以举出两个字，一个是“勤”，一个是“思”。勤和思是人所共喻的，可是怎么勤、怎么思或有不同，而且也因事因类而异。简单来说，我勤在摘记，重在举要，求其统序；思在反复研习，由此及彼，穷其源委，重在比较，由比较而获得新知，如此而已。

十

教学工作是一种辛勤的脑力劳动。我在大学教课将近五十年了，深感为师之不易。学识要博，固然不用说，而难在怎样设计达到预期的效果，使学生确有所得，这是颇费匠心的。我体会到教师就是一个工程师，教学本身是一种创造，我称之为是一门艺术。它不能被单纯看做是一个设计的程序问题，教师在教学进程中，就是一个艺术家，怎样教，就带有不同的艺术性。简单地只说启发式还不够，因为有时教师就是一个演员，要描述什么，指明什么，强调什么，辨别什么，都是要根据对象，根据学生的一般基础而随时设施的，不能用一个模式来范围一切的。所以我体会到教师是一个工程师，教学也是一门艺术。我在教学中注意的是知识的实用性，使学生知道怎样运用知识，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有哪些问题要怎样进行研究。另外，要说明某一学科发展到什么程度，现在还有哪些方面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等等。教课也就是学习的一种实践。心知而不能宣之于口；或能宣之于口，而不能使不知者为知；那还是自己有所不知，有所不明。以己之昏昏就不能示人以昭昭。所以从开始教课那一天起就“夕惕若厉”，兢兢业业，不敢懈怠。所愧能力有限，几十年致力于文字、音韵、训诂几方面的研究，兼顾古今，略有所获，而面对方言、语法所知就极为浅

薄。现在想多学一点，可惜已力不从心，只能整理一些旧稿。如果还有余力，创写一两部新编，那就再好不过了。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一部内容详尽的专书词典《诗经词典》

1986年8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向熹同志编著的《诗经词典》，这是目前我国一部内容较详尽的专书词典。

该词典收录《诗经》里出现的2826个单字做为字头，同时收录复音词语近1,000条，305篇题解和有关诗经研究的术语300余条，总计1,318条。从性质上说，该词典兼有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的某些特点。

词典的内容包括汉语拼音索引、部首检字表、词典正义、《诗经》原文及用韵。附录有：上古声母表、上古韵母表、中古声母表、《广韵》206之韵目及拟音、历代《诗经》研究的重要著作目录。

《诗经》一书，在汉语语音史的研究上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它的用韵为上古韵部系统的建立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这部词典在注音上除了用汉语拼音字母注现代音以外，还注明字的中古音和上古音。又在所收《诗经》原文里注明每一首诗的韵脚及其所在韵部。这对于读者了解《诗经》的语音全貌，是有帮助的。但该词点在编校方面还存在一些缺点，如目录所标页码，与书内实际页码多有不符，特别是《诗经》原文一部分，给读者使用造成了一定困难。

• 中 原 •